

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

魏后凯, 王颂吉

[摘要] 工业化是一个螺旋式转型升级的长期过程。从广义角度看,工业化可分为浅度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两个阶段,前者属于以提高工业比重为目标的**扩张型工业化**,后者则属于以提高工业质量和竞争力为核心的**收缩型工业化**,它是浅度工业化的转型升级。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划分的工业化实现阶段即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实际上只是实现了浅度工业化目标,而工业经济发展任务并没有真正终结。从浅度工业化到深度工业化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大国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必经阶段。中国目前尚未真正完全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前提下,近年来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快速下降,呈现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特征。中国现阶段的“过度去工业化”不仅受“一哄而上”的产业升级冲动影响,而且是要素价格上涨、阶段性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从提升工业化质量以及工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继续推进深度工业化依然任重道远。为此,要消除传统的理论和思想误区,重新审视工业化的重要性,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防范“过度去工业化”。具体措施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加快推进深度工业化,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批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

[关键词] 去工业化; 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深度工业化; 工业化阶段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9)01-0005-18

DOI:10.19581/j.cnki.ciejjournal.2019.01.001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使中国由农业国蜕变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完善且庞大的工业体系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钢筋铁骨”。中国工业化在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从不平衡看,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快、水平高,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慢、水平低;从不充分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城镇化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批准号 14ZDA0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分权、城乡要素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批准号 716032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式分权下的城乡要素配置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批准号 16YJC790101)。

[作者简介]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课程主讲教授,经济学博士;王颂吉,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经济学博士。通讯作者:王颂吉,电子邮箱:wangsongji@126.com。

看,中国工业化的质量较低,工业经济“大而不强”的状况未根本改变,一些关键产品的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因此,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工业经济要实现平衡充分发展和全面转型升级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在工业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近年来人为“降低”工业地位的观点日益流行,中国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过度快速上升,呈现全面、过早、快速的“去工业化”特征。

关于工业化的含义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从广义看,一般把工业化理解为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狭义看,一些学者通常把工业化简单看成是经济发展中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狭义理解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工业化是一个经济体现代工业产生和成长并发挥主要支撑作用的经济现代化过程,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升级是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工业比重的提升作为衡量工业化的唯一标准,也不能单纯以工业比重的下降作为判断工业化是否完成的标志。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科技进步大大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虽然出现下降,但工业经济仍然支撑和引领国民经济增长,工业化开始进入以提升质量和竞争力为核心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尽管工业比重趋于下降,但工业化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全部完成。只有当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再发挥主要支撑作用,现代工业发展已经不再重要,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降低到临界值 N 之下(见图 1),才可以说真正完成了工业化。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之所以提出“再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其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基于上述对工业化的理解,本文把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比重不断提升的阶段称为浅度工业化,这是一种以扩大工业规模和提高工业比重为目标的扩张型工业化;而将后一阶段即工业比重趋于下降的 A 到 B 阶段称为深度工业化,这是一种以提高工业化质量和竞争力为核心的收缩型工业化。从浅度工业化向深度工业化转型升级,是大国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必经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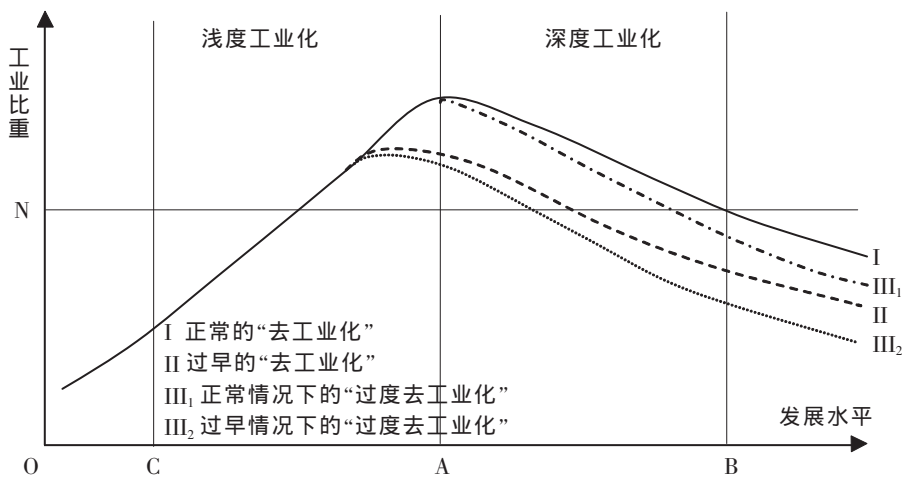


图1 “去工业化”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示意

“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本是指战胜国对德国、日本的工业力量进行限制,从而削弱其经济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经济服务化进程加快,学术界把这一

现象称之为“去工业化”,并围绕“去工业化”的原因及其影响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王展祥等,2011)。随着美国和西欧经济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对“去工业化”的担忧逐渐淡出学术界视野。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之后,同“去工业化”相伴随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加之“去工业化”现象扩散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并且呈现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特征,因此,对“去工业化”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很明显,“去工业化”是基于对工业化的狭义理解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是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从广义角度看,这一概念并不十分准确和严格,因为这期间工业化进程还没有真正完成。考虑到学术界已经广泛使用这一概念,这里本文仍采用“去工业化”来表示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比重下降的过程。

一般而言,“去工业化”有正常的“去工业化”和过早的“去工业化”之分。其中,正常的“去工业化”是按照经济结构演变的正常轨迹,工业比重在达到预期的顶点之后出现正常下降的过程;过早的“去工业化”是在经济结构演变正常轨迹的拐点到达之前,就过早出现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其实质是工业比重由上升转变为下降的拐点提前了,顶点峰值降低了。正常和过早的“去工业化”会对经济发展绩效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正常的“去工业化”实现了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有效率升级。但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不同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包括巴西等拉美国家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水平不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国民收入水平较低之时,经济结构就向效率较低的传统服务业转型(乔晓楠和杨成林,2013),这是典型的过早“去工业化”,导致拉美国家难以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

无论是正常的“去工业化”还是过早的“去工业化”,都有可能存在“过度去工业化”的情形,即相对于“去工业化”的正常轨迹而言,工业比重下降的程度过大、速度过快。前者可称为正常情况下的“过度去工业化”(III₁),后者则称为过早情况下的“过度去工业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把过早的“去工业化”纳入“过度去工业化”的广义范畴。因此,“过度去工业化”可以界定为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演变的正常轨迹,工业比重出现过早、过快、过大的下降现象,由此影响到工业支撑作用的发挥和国民经济增长。

在工业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中国近年来不仅存在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而且“去工业化”还呈现全面、快速的特征,从广义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过度去工业化”。“过度去工业化”问题的出现,同中国近年来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产业转型方式密切相关。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中国的工业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刘志彪,2008;王岚和李宏艳,2015),从事一般零部件制造、产品组装等增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价值链升级之路步履维艰。近年来,随着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存在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魏龙和王磊,2017)。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成为理论与实践部门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发达国家的服务化转型趋势和产业发展经验,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应“对标发达国家”加快发展服务业,以此推动中国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不仅成为实践部门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思路,而且进一步助推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

本文基于对中国“过度去工业化”问题的分析认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转型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中国工业化不平衡不充分、国民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较低的背景下,服务业的发展不应建立在“过度去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工业经济的充分发展和转型升级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

高生产效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其工业化的任务也远未真正全部完成,仍应通过创新来提升工业质量和竞争力,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作用。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研究中国现阶段“过度去工业化”的特征事实,剖析全面、过早、快速的“去工业化”现象;第三部分论证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的原因及其危害;第四部分对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进行反思,认为以提升工业质量和竞争力为核心目标的深度工业化,是一国实现工业化转型、迈向工业强国征程中的重要阶段;第五部分提出防范“过度去工业化”的主要措施。

二、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特征事实

改革开放 40 年来,工业化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国土双重意义上的大国快速推进,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成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强大引擎。在充分肯定中国工业化成就的同时,也应客观认识到中国工业化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实。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强,这表现为大多数工业企业缺乏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和知名品牌,使得中国的工业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高端工业产值比重、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价值增值能力较低;二是工业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问题,按照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已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部分发达省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但中西部省份大多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并且其工业化需求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中西部地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十分繁重;三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制造业服务化是世界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但中国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这不利于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必须加快形成有效的融合互促发展关系。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前提下,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典型的“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去工业化”呈现出全面、过早、快速的特征。所谓“全面”,是指在全国、地区及省级层面都出现了“去工业化”^①;所谓“过早”,其含义同前所述;所谓“快速”,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总体情况而言,中国的工业比重下降和服务业比重上升速度很快。

1. 全面的“去工业化”

尽管中国不同地区的工业化阶段各异,但近年来全国、地区及省级层面都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因此可称之为全面的“去工业化”。

(1)全国层面的“去工业化”。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无论是从增加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看,中国近年来在全国层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

从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国 GDP 的比重看(见图 2),1978—2017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40%以上;从 2007 年开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呈波动下降趋势,由 2006 年的 47.6%降至 2017 年的 40.5%,尤其是 2012 年以来快速下降。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以来上升了近 30 个百分点,尤其是 2012 年之后第三产业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其增加值比重由 2012 年的 45.3%快速上升至 2017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全面摸清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针对服务业统计相对薄弱的问题,中国于 2004 年、2008 年、2013 年开展了全国经济普查。国家统计局一方面利用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对普查年度及历年数据做了修订,使历年 GDP 及三次产业数据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改进了服务业统计调查方法及核算制度,提高了常规年度服务业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使其基本能够反映服务业发展情况(郭同欣,2010)。基于此,本文可以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年的51.6%。从第二产业内部^①看,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42.0%降至2017年的33.9%,下降8.1个百分点,工业同第二产业基本保持了同样的变动趋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近年来波动下降,由2006年的32.5%降至2016年的28.8%,尤其是2012—2016年快速下降了2.7个百分点(见图3)。总体而言,无论是从第二产业、工业还是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看,全国层面从2007年开始都出现了“去工业化”,并且2012年以来这一趋势明显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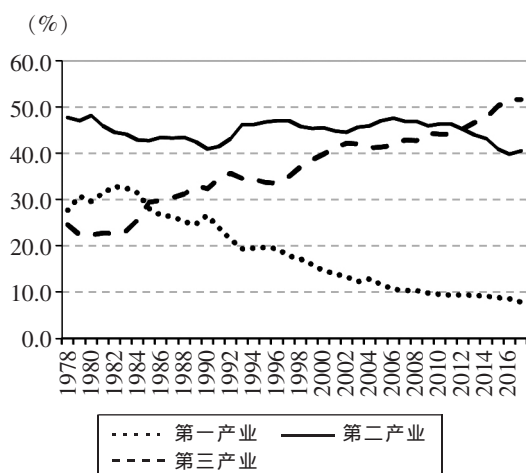


图2 1978—2017年中国三次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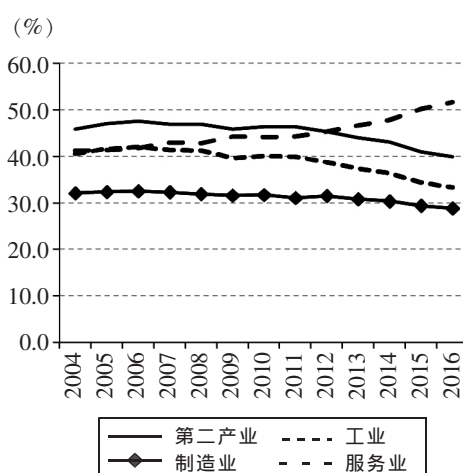


图3 2004—2016年中国部分产业(行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

从工业部门各行业的增加值变动看,近年来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较快,采矿业和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石油加工及炼焦、电力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速放缓。2012—2016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28.2%升至32.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由9.4%升至12.4%,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重由29.6%降至28.1%,采矿业增加值比重由13.9%降至7.2%^②,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较为明显。但从工业部门各行业的变动幅度看,五年来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上升7.7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和采矿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下降8.2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提升不能弥补六大高耗能行业和采矿业的比重下降。

从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看(见图4),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7.3%波动上升至2012年的30.3%;此后下降至2017年的28.1%,进入“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与此相对应,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始终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12.2%上升至2017年的44.9%,增加了3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从1994年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城镇新增人口就业的主力军。从工业及所包含的三类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城镇单位总就业人员的比重看(见图5),2005—2017年,工业就业所占比重由35.3%波动下降到31.0%,其中,

① 第二产业包括四类行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其中,前三类行业的加总之和即为工业。

② 国家统计局. 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动力结构调整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八[EB/OL]. http://www.stats.gov.cn/zjtj/ztfx/18fzcyj/201802/t20180212_1583215.html, 2017-07-28.

2014—2017 年快速下降了 3.7 个百分点。在工业所包含的三类行业中,2005—2017 年,制造业的就业比重由 28.2% 波动下降到 26.3%,其中,2014—2017 年快速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采矿业的就业比重由 4.5% 降至 2.6%,下降幅度较大;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就业比重由 2.6% 下降到 2.1%。总体而言,无论是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还是从工业和制造业就业比重看,全国层面从 2012 年就开始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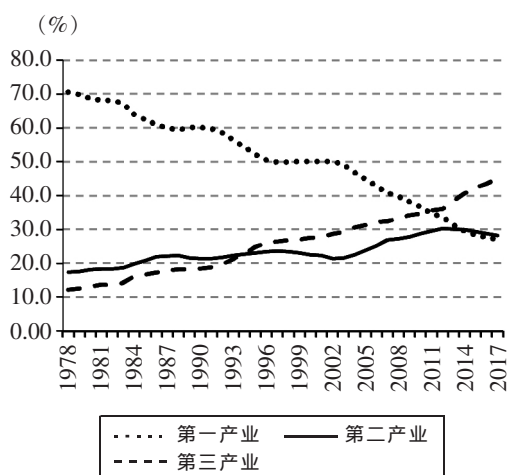


图4 1978—2017 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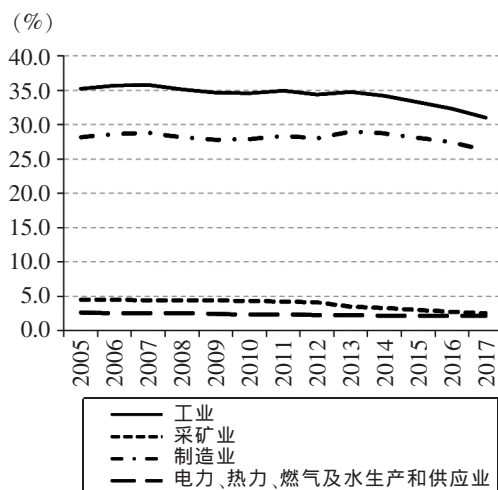


图5 2005—2017 年中国城镇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2)地区层面的“去工业化”。从工业增加值比重看,2008—2016 年,全国各地区的工业增加值比重都出现下降,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下降 9.27 和 13.26 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下降 4.97 和 5.56 个百分点^①。到 2016 年,西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1.14%,已经低于东部 (33.17%)、东北 (31.81%) 和中部地区 (37.61%)。

从就业比重看,2013—2016 年,东部、东北地区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下降 2.36 和 0.91 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仅上升 0.56 和 0.57 个百分点。2016 年西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 18.45%,远低于东部 (33.14%)、东北 (21.46%) 和中部地区 (27.23%)。由此可见,近年来全国四大区域都在产出层面出现了“去工业化”,东部和东北地区在就业层面也出现了“去工业化”。

(3)省级层面的“去工业化”。省级层面近年来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看,2008—2016 年,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 31 个省份大都呈下降趋势,仅贵州、广西、西藏、安徽、吉林、福建、湖北 7 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有所上升。其中,黑龙江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超过 23 个百分点;山西、上海、天津、甘肃、江苏、山东、辽宁的下降幅度超过 10 个百分点;浙江、新疆、广东、河南、海南、北京、河北的下降幅度介于 5—10 个百分点之间。

从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动情况看,2008—2016 年,仅安徽和广西略有上升,吉

^① 在本文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10 个省份;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3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山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 6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藏 12 个省份。

林变动值为0,其他28个省份的工业增加值比重都出现下降。其中,黑龙江的工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超过20个百分点;山西、辽宁、甘肃、上海、天津、新疆、江苏、山东、海南9个省份的下降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云南、浙江、青海、宁夏、河南、广东、河北、北京、陕西9个省份的下降幅度介于5—10个百分点之间。

从就业比重的变动情况看,2014—2016年,有10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除山东和江苏外都为中西部省份,其中贵州和西藏的上升幅度超过2个百分点;云南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保持不变;有20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下降,其中天津、辽宁、福建、内蒙古、山西、北京、浙江、上海、新疆9个省份的下降幅度超过2个百分点,且以东部省份居多。总体而言,全国2/3数量的省份2014年以来在就业层面均出现较为明显的“去工业化”,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表现突出,而中西部地区也有近半数的省份在就业层面出现“去工业化”。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其工业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差异,按照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方法,东部发达地区的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山东等省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这些省份的“去工业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产业结构升级的表现;而山西、新疆、甘肃、云南、青海、宁夏、陕西、河南等中西部省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黄群慧,2013),这些省份实现工业化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现阶段上述省份出现“去工业化”属于反常现象,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2. 过早的“去工业化”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时已经实现第一阶段的浅度工业化,国民经济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达到较高水平,产业结构具备向更高层次升级的条件;二是国民经济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三是先进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从制造业就业比重、国民收入水平、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看,中国东部一些地区的“去工业化”大体可以看作产业升级的表现,而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些地区尚未完全具备“去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因此属于过早的“去工业化”。

从制造业就业比重看,根据丹尼·罗德里克(2013)的研究,发达国家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峰值一般在30%以上,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达到近40%的峰值。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就业比重达到峰值后,“去工业化”现象才开始出现,制造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下降。同发达国家相比,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制造业就业比重较低的情况下,过早地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1950—1980年,巴西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在30年间仅从12%上升到15%,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丹尼·罗德里克,2013)。中国的制造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长期以来明显偏低,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在2012年达到30.3%的峰值后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知制造业就业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

从国民收入水平看,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人均GDP已达到10000美元左右(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巴西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开始了“去工业化”(丹尼·罗德里克,2013)。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2007年人均GDP仅为1659美元,2012年为2538美元,2017年增至3485美元^①,中西部地区人均GDP更低,国民收入水平同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丹尼·罗德里克(2016)通过一项涉及4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研究发现,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199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产出和就业比重达到峰值时的国民收入水平,是1990年之前发达国家达到峰值时的40%左右,“去工业化”在新兴市场国家过早到来。因此也可以判断,中国在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时就出现工业产出及就业比重下降,属于典型的过早的

^① 笔者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

“去工业化”。

从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水平看,“大而不强”是中国工业的基本特征,中国的制造业目前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龙头、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技术研发、品牌、管理等优势,占据增加值较高的价值链高端环节;中国企业则主要承担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被“锁定”在附加值较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白永秀和王颂吉,2015),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受制于人。因此,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尚不具备充足的技术优势,这使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坚实的制造业支撑。

3. 快速的“去工业化”

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 2012 年之后,中国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快速上升,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快速转变。从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动情况看,2001—2011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年均提升 0.4 个百分点;2012—2017 年,年均提升幅度超过 1.2 个百分点,由 2012 年的 45.3%快速上升至 2017 年的 51.6%,远快于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转型时期的服务业发展速度。与此相对应,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由 2012 年的 38.7%降至 2017 年 33.9%,除去 2017 年略有上升之外,2012—2016 年,年均下降幅度超过 1.3 个百分点,呈现快速的“去工业化”特征。从国际比较看,1985—2014 年,中国服务业产出比重提高了 21.3%个百分点,根据阿德里安·伍德(2017)的研究,同期印度、苏联成员国、拉丁美洲、中东与北非的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变动分别为 14.1、18.0、12.5、-0.3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变动为 7.0 个百分点,中国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变动速度快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从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看(见表 1),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17 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逐年减少,其中 2015—2017 年每年都减少了 300 万人以上。相对应地,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快速增加,2013—2017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每年增加 900 万人以上,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每年提升超过 1 个百分点,这同样反映了快速的“去工业化”。根据阿德里安·伍德(2017)的研究,1985—2014 年中国、印度、苏联成员国、拉丁美洲、中东与北非的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幅分别为 26.8、12.8、9.3、11.0、12.6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幅为 16.2 个百分点,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速快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表 1 2012—2017 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变动情况

	就业人数(万人)		就业人数年增量(万人)		就业比重(%)		就业比重年增量(百分点)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2	23241	27690	-71	408	30.3	36.1	0.8	0.4
2013	23170	29636	-71	1946	30.1	38.5	-0.2	2.4
2014	23099	31364	-71	1728	29.9	40.6	-0.2	2.1
2015	22693	32839	-406	1475	29.3	42.4	-0.6	1.8
2016	22350	33757	-343	918	28.8	43.5	-0.5	1.1
2017	21824	34872	-526	1115	28.1	44.9	-0.7	1.4

具体到省级层面,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动情况看,2008—2016 年,全国有 15 个省份该比重的下降幅度超过 5 个百分点,其中 8 个省份的下降幅度超过 10 个百分点。从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动情况来看,2008—2016 年,全国有 19 个省份该比重的下降幅度超过 5 个百分点,其中 10 个省份的下降幅度超过 10 个百分点。这些快速“去工业化”的省份中,

不乏甘肃、新疆、山西、青海、河南等工业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省份,这些省份的快速“去工业化”隐含着巨大的“工业空心化”隐患。

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的原因及其危害

在工业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后,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国民经济向服务化转型符合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但一些学者把产业升级简单理解为由工业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主导,忽视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全面深度融合,人为或刻意地提高服务业比重成为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思路。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业快速发展,各级政府在新常态下把发展服务业作为主攻方向,工业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在此背景下,工业“地位下降”,加之要素成本上涨、工业产能过剩、环保压力加大、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困难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过度去工业化”,这会对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1. 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的原因

中国现阶段的“过度去工业化”,不仅是受“一哄而上”的产业升级冲动影响,而且是要素价格上涨、阶段性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一哄而上”的产业升级冲动。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以强大的制造业作为支撑。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一些学者简单地认为服务业相对于农业和工业而言在产业形态上更为高级,发展服务业便代表了产业升级方向,因此主张政府积极引导生产要素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部门流动。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十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思路就是“降低农业和工业比重、提高服务业比重”。显然,这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误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在节能减排约束和中央“环保督查”压力下,相对于服务业而言,工业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被某些地方政府和民众认为是高污染、高能耗、占地多、事故多的“劣质产业”,这导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黄群慧,2014)。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吸纳就业、拉动增长的主力军,各地“一哄而上”竭力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发展新引擎,社会上更多的资源由农业、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这成为近年来服务业快速发展和“过度去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

政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应该超越发展阶段,人为或刻意地去追求过高的服务业比重。事实上,在“十三五”规划制定中,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层面,都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倾向。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重要达到56.0%,但2016年和2017年实际均只有51.6%,离预期目标差距较大。中国地区差异较大,各地应根据自身产业发展阶段制定符合实际的产业发展政策,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避免“一哄而上”。受发展基础、地理区位、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地区呈现工业化水平依次降低的特征。基于此,东部地区的发达省份应助力工业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省份则应立足于工业化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实际,扎扎实实推进绿色环保的新型工业化,促进新型工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由此可见,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包括一些东部省份的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尽管有助推中国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转型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超越发展阶段的“过度去工业化”,值得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2)“多管齐下”的要素成本压力。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工业企业利润率走低,加快推动了工业企业进行产业转型。从劳动力成本变动看,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但近年来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和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加快,加之农民工的职业保障政策不断完善,使得工业企业的用工成本逐年走高。卢锋(2012)研究了中国农民工的长期工资走势,发现农民工工资近十年的年均增速超过10%,逐步趋近于城镇正式职工工资。牛津经济研究院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2015年的劳动力成本已接近美国,是印度的2倍以上,明显高于日本、墨西哥和中国台湾(杨继生和黎娇龙,2018)。近年来用工成本的快速上升,挤压了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对工业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了较大影响。从土地成本变动看,工业企业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零地价”或“低地价”曾是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但从21世纪初开始,中央实行严格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制度,各地在土地供给方式上也普遍实行“招拍挂”制度,这就推升了工业用地价格和工业企业的用地成本。此外,受土地供应制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全国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大都经历了多轮快速上涨,这倒逼工人工资出现了偏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快上涨,进一步抬高了工业企业的用工成本。陆铭等(2015)研究发现,由于2003年之后国家压缩东部地区的土地供应,造成东部地区的房价快速上升,进而推升了东部地区的工资上涨。

在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工业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严重影响了工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投资水平。一般而言,中国民间投资的80%以上集中在制造业,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3—2016年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从23.1%逐年下降至18.1%、10.1%、3.2%(杨继生和黎娇龙,2018),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要素成本尤其是工人工资的快速上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作为支撑,这迫使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通过以下路径进行转型:一是“机器换人”,即用相对廉价的资本代替成本更为昂贵的劳动力,出现过度的资本深化;二是“技术升级”,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奋力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但由于价值链升级具有高投入、风险大、周期长等特点,决定了工业企业的技术研发水平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显著提高;三是“产业转型”,中小型工业企业为维持生存和追求利润,转而投资于收益更高的房地产、金融等服务业;四是“走出去”,即向要素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的工业企业上述转型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中国近年来“过度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但需要重视的是,工业企业现阶段的过度资本深化或产业转型,偏离了中国仍存在数亿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劳动力乃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客观事实,可能会损害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3)产能过剩的阶段性影响。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之后,严重的产能过剩不期而至,“去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副产品。2011年以来,产能过剩主要出现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工业行业,在国际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此轮产能过剩难以通过市场逐步消化,“去产能”成为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钢铁、有色、化工、建材、采矿业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增速明显放缓,其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趋于下降,但由于先进制造业的增速落后于过剩产能淘汰的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去工业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同粗放的工业化模式密切相关,同时反映了中国工业的“大而不强”问题。因此,要真正化解产能过剩,应加快以智能制造替代工业“落后产能”,以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以服务化助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走创新驱动、智慧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工业化之路,进一步发挥现代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2. “过度去工业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

相关研究表明,东亚高收入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之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比重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了长期持续增长,这对于它们成

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之后,制造业实际比重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呈现下降趋势,即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黄群慧等,2017)。很明显,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筋骨”,而且是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依托,因此,保持一国(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对于推动一国(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和结构转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度去工业化”则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1)抑制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一般而言,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传统服务业,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较之于传统服务业更利于带动经济增长,因此,充分发挥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功能,对于一国成功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至关重要。丹尼·罗德里克(2016)把制造业称之为“扶梯行业”,认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部门是带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扶梯”,充分实现高质量工业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如果一个经济体过早出现快速“去工业化”,即工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快速下降,就等于抽走了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扶梯”。此时,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得到完全发挥,而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往往高于服务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这一时期的“去工业化”实质上是低生产率部门代替高生产率部门(屈宏斌,2015),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造成消极影响。例如,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过早地开始了“去工业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缓慢,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7—2017年,中国第二产业人均年增加值从6.3万元增至15.3万元,第三产业人均年增加值从4.7万元增至12.2万元,两大产业的人均年增加值始终有1.5万元以上的差距,2017年这一差距扩大至3.1万元。如果把人均年增加值近似看作劳动生产率,可知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第二产业。在此背景下,中国近年来的“过度去工业化”推动就业人员由第二产业快速转移到第三产业,会显著拉低单位就业人员所能创造的GDP,这不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拖累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提升。

(2)阻碍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业通常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被企业用作进一步生产有形产品及其他服务的中间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竞争力。在现代经济结构中,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共生共荣、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为先进制造业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生产服务,提高制造业各环节的运营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刘明宇等,2010),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的结果,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以发达的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制造业的规模化、高端化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庞大的先进制造业提供市场需求,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就很难获得长足发展。在先进制造业尚未发展成熟的背景下出现“过度去工业化”,必然会削弱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空间,甚至会造成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替代,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先进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先进制造业发展乏力。尽管中国当前已成为“世界工厂”,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工业企业大多位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从事一般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很多行业尚未掌握核心技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王文和孙早(2017)研究发现,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提高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改善,并且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需求程度的提高对生产

性服务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现阶段应防范“过度去工业化”,积极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使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备更为坚实的工业支撑,这对提升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不利于城镇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对于促进城镇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力量。工业化与城镇化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城镇是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工业化则为城镇规模扩张和数量增加提供产业支撑。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产业集聚与分工,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快速提升至2017年的58.52%。但由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各异,中西部省份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的城镇化进程。从2017年全国各地区的城镇化率看,东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除海南、吉林、河北之外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省份除重庆、内蒙古、湖北之外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有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50%。工业经济发展是中西部省份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产业载体,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出现的“过度去工业化”,会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缺乏工业产业支撑,这对于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城镇化健康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过度去工业化”还会影响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带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转移至城市。1978—201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就业人员的比重由70.5%降至27.0%,城乡就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平均约为3%(Lagakos and Waugh, 2013),这说明中国今后仍有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工业仍是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部门。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看,2016年全国91.7%的农业从业人员^①、73.6%的农民工^②仅具备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短期内难以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而且传统服务业就业人员在生产效率上缺乏优势,因此,规模庞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对于吸纳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在现阶段出现“过度去工业化”,必然会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不利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进而可能会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四、对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的反思

基于对工业化的狭义理解,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分为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阶段。在实现工业化阶段,要素由传统农业部门流向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在工业比重达到顶点之后,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比重趋于下降,服务业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并超越工业部门,由此推动一个经济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实现工业化阶段的经济结构变迁进行了大量研究。科林·克拉克把配第的工商业发展思想从收入领域拓展到劳动力就业结构领域,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然后再转移到服务业。学术界将上述观点称之为配第一克拉克定律。西蒙·库兹涅茨把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的思想进一步拓展到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他基于13个工业国的产业结构数据测算发现,农业产值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下降,工业产值比重逐步上升,服务业产值的比重变化不明显(Kuznets, 1966)。根据上述经济结构演变的思想,结合国民收入水平标准,霍利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斯·钱纳里等人把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包括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三个细分阶段。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成为学术界划分工业化阶段的基准。在后工业化研究方面,丹尼尔·贝尔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论证了后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即工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趋于下降,服务业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并且认为后工业化社会是技术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Bell,1973)。

虽然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实践看,工业部门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是先上升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持续上升,这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得到了麦迪森等相关研究的证实(Maddison,1980),但是,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一旦越过由上升转变为下降的顶点,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工业化的终结?显然,钱纳里等人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标准,并且是建立在对工业化的狭义理解之基础上。首先,根据本文对工业化的界定,即使一国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越过了由上升转变为下降的顶点,其工业化的进程并没有全部完成,现代工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工业比重下降到某一临界点(N)为止。其次,工业化的进程不单纯是工业经济规模扩张的过程,更是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传统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更多看重的是工业经济规模扩张,并把工业比重的升降作为判断工业化阶段的核心标准,而忽视了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工业竞争力和支撑作用等关键因素。事实上,工业发展质量、工业竞争力以及工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都是判断工业化阶段以及工业化是否完成的重要标准。最后,即使在工业比重下降之后,从一个较大的空间范围看,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有坚实的制造业支撑,需要重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地位,这就需要处理好工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从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看,发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随着工业比重的下降,服务业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并超过工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但服务业存在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之分,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体的传统服务业的生产率一般低于工业部门,在服务业同工业存在生产率差距的情况下,服务业比重的快速上升会产生服务业高价格同其低效率不相匹配的“鲍莫尔成本病”,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导致一国落入“服务业低效率陷阱”,难以顺利向高收入经济体跃升。宋建和郑江淮(2017)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近年来服务业比重的快速上升“拉低”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即存在明显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理性剖析近年来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是否存在传统服务业“虚高”,进而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加快生产率较高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然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依赖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壮大,所以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尤为迫切。由此可见,发达的工业经济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服务业在大国经济中的比重并非越高越好,而是取决于工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工业同服务业之间应形成融合互促的良性发展关系。因此,在工业比重趋于下降之后,继续推动工业经济深度发展和转型升级,对于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结构高级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看,虚拟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工业发展。从产业划分看,工业、农业、建筑业是生产有形产品的部门,可以看作狭义的实体经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服务业是生产无形产品的部门,可以跟工业、农业、建筑业一起纳入广义的实体经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则构成了“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黄群慧,2017)。对一国经济发展而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做大做强;虚拟经济的根本职能在于服务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有助于优化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

(李扬,2017;王国刚,2018)。从国际经验看,虚拟经济不仅可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且存在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循环、自生发展的可能性。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生发展时,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所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可能会高于实体经济,这一方面会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会产生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所引发的“泡沫”非理性膨胀(陈雨露和马勇,2012),以上因素成为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从中国的虚拟经济发展看,金融业占 GDP 的比重由 2007 年的 5.6% 快速增至 2015 年的 8.4%,2017 年小幅回落至 7.9%,房地产业占 GDP 的比重由 2007 年的 5.1% 快速增至 2017 年的 6.5%,中国的虚拟经济所占比重甚至已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增速过快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我们,虚拟经济的根本职能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虚拟经济不应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因此,必须切实避免产业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所代表的虚拟经济是服务业的组成部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同“去工业化”或“经济服务化”存在密切关系。美国次贷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已普遍认识到“去工业化”相伴随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存在的风险,美国于 2010 年启动了“再工业化”战略,着力扶持新能源、新材料、3D 打印、“互联网+工业”等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德国提出了工业 4.0 战略,旨在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实现智能制造。美国、德国实施的“再工业化”和工业 4.0,目的不是要提升工业部门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而是增强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保持并提升一国高端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相关研究表明,国家间制造业能力的差异能够解释它们之间 70% 的国民收入差距(Hausmann et al.,2013),由此可见,保持并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对于驱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工业化是一个螺旋式转型升级并不断演进的长期过程。根据前面的界定,把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浅度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两个阶段。过去按照传统理论划分的工业化实现阶段即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阶段,实际上只是一种浅度工业化,它是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工业规模扩张和比重提升的扩张型工业化。不同于浅度工业化,深度工业化主要是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工业质量和竞争力。由于这一阶段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已出现下降并逐步趋于稳定,因此它属于收缩型的工业化,其核心在于提高工业化的质量。严格地说,目前流行的从狭义角度界定的后工业化概念并非十分准确,因为这一时期工业化的进程并没有完全完成,工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仍然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与前一阶段的浅度工业化相比,深度工业化在本质特征、核心目标、结构变动、发展路径和支持政策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见表 2)。在核心目标上,浅度工业化阶段以做大工业规模、提高工业比重为核心目标,尤其体现为做大工业企业生产规模和提高工业产品供给能力;而深度工业化阶段则以提高工业质量和竞争力为核心目标,尤其体现为不断提高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发展路径上,浅度工业化阶段主要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来实现工业规模扩大和比重提升;而深度工业化阶段则需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来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支持政策上,浅度工业化阶段主要实行工业扩张型政策,出口导向型工业政策便是其中的一种;而深度工业化阶段则实行质量导向型政策,追求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很明显,将工业化

表 2 工业化的两个阶段特征比较

工业化阶段	传统阶段划分	本质特征	核心目标	结构变动	发展路径	支持政策
浅度工业化阶段	工业化实现阶段	扩张型工业化	扩大工业规模和提高比重	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上升	要素投入驱动	工业扩张型政策
深度工业化阶段	后工业化阶段 (图 1AB 区间)	收缩型工业化	提高工业质量和竞争力	工业比重先下降,然后稳定	创新驱动	质量导向型政策

进程划分为浅度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进一步拓展了工业化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工业化阶段理论的内涵,避免了过度强调工业规模和工业比重指标的局限性。这种阶段划分更加符合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大国的国情特征。

在深度工业化阶段,尽管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会出现下降,但工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依然举足轻重、不可忽视。为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政府必须实行深度工业化战略,依靠现代科技革命,大力推进工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提升工业质量和竞争力,并把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保持在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合理区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的大国而言,即使未来迈入了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发达国家行列,其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也应该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而不可能像某些发达的中小国家那样无限制地“降低”工业比重。在实现浅度工业化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转型进一步推动实现深度工业化,全面提升工业质量和全球竞争力,并把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维持在合适的水平,这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大国真正实现充分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实现这种工业化转型的核心是工业的“三个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所谓质量变革,就是工业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科技和知识含量,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个性化、高端化的工业产品消费需求,在此过程中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和产品品牌;与此同时,工业企业逐步向绿色低碳转型,不断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三废”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所谓效率变革,就是工业领域的高效率企业替代低效率企业、优质要素替代劣质要素、先进技术替代落后技术、现代管理替代传统管理,加之与现代工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日益成熟,从而使工业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全面提升,即以最少的要素投入生产出最多的优质产品。所谓动力变革,就是工业经济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工业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即通过技术创新为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不是像浅度工业化阶段那样主要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来做大工业规模。对于一国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而言,通过深度工业化阶段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工业经济可以在价值链升级过程中保持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并且走出一条创新驱动、智慧高效、绿色低碳之路,实现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工业经济的支撑下,现代服务业将具备更为坚实的发展基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国际竞争力将逐步提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实现有效率的转型升级。

五、防范“过度去工业化”的主要措施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大国,其工业化进程存在典型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大而不强”仍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当前,虽然中国整体已进入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所界定的工业化后期即浅度工业化后期,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继续推进深度工业化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在新时期,为有效应对中国经济出现的“过度去工业化”问题,同时为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充分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消除传统的理论所造成的思想误区,重新审视工业化的重要性,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具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区应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深度工业化,通过创新提升工业质量和竞争力,筑牢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根基;在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工业发展,积极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基地,使新型工业化在中西部地区得到充分发展;与此同时,依托新技术革命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逐步实现产业结构有效率升级。以此为基础,既可以防范“过度去工业化”,又同时能够推动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第一,实行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工业转型升级战略。工业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是大国产业结构实现有效率升级的基础条件。当前中国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制造强国,仍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为此,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原则,针对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实行差别化的工业转型升级战略。当前,重点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工业经济的“去、补、提”,切实增强中国工业经济的世界影响力、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控制力,全面提升工业化的质量,并使工业就业和增加值比重在国民经济中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深度工业化。所谓“去”,就是有序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不断降低高耗能行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所谓“补”,就是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高地,推动企业工艺流程再造,扩大中高端供给;所谓“提”,就是着力提升企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之逐步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营销、品牌、技术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产能合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紧密的工业分工协作关系,进而构建“一带一路”工业价值链,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由工业大国跃升为工业强国,而且有助于实现沿线国家工业经济协同发展。

第二,着力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批先进制造业基地。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中西部地区实现工业化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目前,中西部地区农业就业比重较高,农村人口比重较大,今后仍有大量劳动力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协同推进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新发展理念下,中西部地区不能再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老路,而应着力推进创新驱动、智慧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新型工业化,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目前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劳动力还难以短期内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应该是分层次、多元化的,除了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外,进一步巩固提升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对于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工业空间布局上,过去大多把着眼点放在省会(首府)城市和大城市上,而对中小城市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中西部中小城市要素成本低,发展空间和潜力较大,应该成为未来推进工业化、发展制造业的重要载体。为此,可以考虑在中西部省会(首府)城市之外,选择发展基础较好、交通条件便利、环境承载力较高的中小城市建立一批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并在资金、技术、土地供应、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使这些制造业基地充分发挥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逐步形成一些新的先进制造业集聚中心。在中西部地区加强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不仅可以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而且可以为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就近城镇化创造条件。

第三,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发展趋势。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职能是为制造业提供配套服务,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制造业的扩张则会引致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扩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制造业的专业化、规模化、高端化;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是制造业效率提升、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深化价值链分工、降低价值链内部的生产及交易成本、促进价值链内部的创新等途径(周鹏等,2010),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制造业竞争力。在新形势下,应充分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机遇,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积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引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延伸服务链条、重塑业务流程,由提供工业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并重转变,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生产性服务,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同时,要摒弃单纯重视“提高服务业比重”的产业升级观念,加强金融监管和房地产调控,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逐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阿德里安·伍德. 世界各国结构转型差异(1985—2015):模式、原因和寓意[J]. 经济科学, 2017,(1):5-31.
- [2]白永秀,王颂吉. 价值链分工视角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工业经济协同发展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41-49.
- [3]陈雨露,马勇. 泡沫、实体经济与金融危机:一个周期分析框架[J]. 金融监管研究, 2012,(1):1-19.
- [4]丹尼·罗德里克. 过早开始“去工业化”的危险[J]. 南风窗, 2013,(22):85.
- [5]丹尼·罗德里克. 过早去工业化[J]. 比较, 2016,(1):80-114.
- [6]郭同欣. 关于我国服务业统计和占比的有关问题[J]. 中国信息报, 2010-06-17.
- [7]黄群慧. “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10):5-19.
- [8]黄群慧.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J]. 经济与管理, 2013,(7):5-11.
- [9]黄群慧. 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9):5-24.
- [10]黄群慧,黄阳华,贺俊,江飞涛. 面向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战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2):94-116.
- [11]李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辨[J]. 经济研究, 2017,(6):4-16.
- [12]刘明宇,芮明杰,姚凯. 生产性服务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升级的协同演进关系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8):66-75.
- [13]刘志彪. 生产者服务业及其集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要素与实现机制[J]. 中国经济问题, 2008,(1):3-12.
- [14]卢锋. 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7):47-67.
- [15]陆铭,张航,梁文泉. 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5):59-83.
- [16]乔晓楠,杨成林. 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与经济绩效:一个分类比较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6):5-17.
- [17]屈宏斌. 过早去工业化很危险[N]. 经济参考报, 2015-06-17.
- [18]宋建,郑江淮.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2):1-13.
- [19]王国刚. 金融脱实向虚的内在机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7):5-23.
- [20]王岚,李宏艳.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2):76-88.
- [21]王文,孙早. 制造业需求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J]. 财贸经济, 2017,(7):136-155.
- [22]王展祥,王秋石,李国民. 去工业化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问题探索, 2011,(1):18-23.
- [23]魏龙,王磊. 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6):71-86.
- [24]杨继生,黎娇龙. 制约民营制造企业的关键因素:用工成本还是宏观税负[J]. 经济研究, 2018,(5):103-116.
- [25]周鹏,余珊珊,韩剑.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间相关性的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0,(9):55-62.
- [26]Bell, D.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27]Hausmann, R., C. A. Hidalgo, S. Bustos, M. Coscia, A. Simoes, and M. A. Yildirim. The Atlas of

-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M]. MA: The MIT Press, 2013.
- [28]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29]Lagakos, D., and M. E. Waugh. Selection, Agriculture, and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103(2):948-980.
- [30]Maddison, A.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A]. Leveson, I., and Wheeler, W. eds. Wester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C]. London:Croom Helm, 1980.

Phenomenon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f China's 'Over De-industrialization'

WEI Hou-kai^{1,2}, WANG Song-ji^{3,1}

- (1.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CAS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SS, Beijing 102488,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takes a screw typ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a broad sense, industrial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shallow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ep 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stage belongs to the expansion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aims at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y. The second stage belongs to the contraction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aims at improving industrial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and deep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st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hallow industri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theory divid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realization stages into the early stage, the middle stage and the late stage. In fact, the industrialization realization stage only achieves the goal of shallow industrialization. The task of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not really end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shallow industrialization to deep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insurmountable stag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major country. China has not fully realized industrialization y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added value and industrial employment were having a rapid decline in recent years, which could be called over de-industrialization. Over de-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ppears the features of comprehensive, precocious and quickly. At the present stage, over de-industrialization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rush forward” impuls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also affected by the increasing of factor price and overcapacity. Over de-industrialization could have a serious negatively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ence. For a long tim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real economy and virtual economy, industries dominated b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will remain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e should eliminat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re-examine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addition,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deep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event over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main path of preventing over de-industrialization is to accelerate the deep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s, build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ase in the midwest, and promoting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 de-industrializati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deep-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JEL Classification: O14 O20 P20

[责任编辑:王燕梅]